

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道文獻的西傳

潘鳳娟

《關於中國之記錄》系列叢書可以說是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學者認識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其中《中國古今之孝道》是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所譯介。他在本書中選譯了清朝初期康熙乾三代，多種長短篇幅不一與孝道相關之帝國文獻，其中又以康熙朝相關的文獻為大宗，甚至全文翻譯了康熙的〈御製孝經衍義序〉。本文討論韓國英所譯介的清朝「帝國文獻」，並從此書在法國皇室主導有關中國系列叢書的出版觀之，似乎顯示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所及，已經對法國政治結構和倫理體系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甚至是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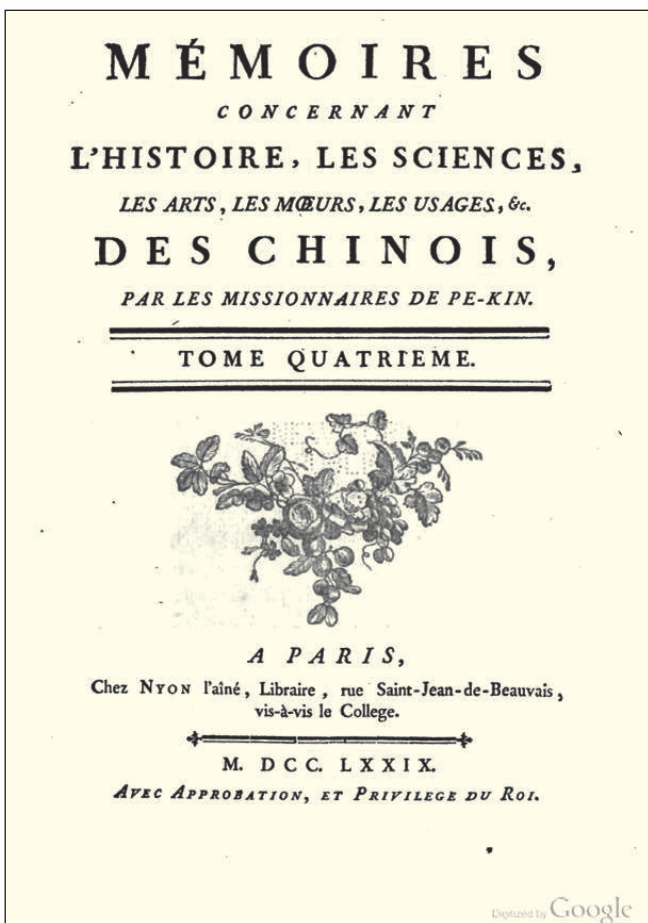
十八世紀歐洲啟蒙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之所以可能，十六至十八世紀間入華傳教士扮演了關鍵性角色。身為文化與宗教媒介的耶穌會傳教士，全面性地傳播雙方的語言文

字、歷史地理、經典、宗教、思想、藝術、音樂、科學、技術等等各層面的文化，並且在近代中西交流過程中，使中歐雙方自身傳統產生結構性變化。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Pierre-

Martial Cibot, 1727-1780），正是其中一員。他於一七二七年八月十四日出生於法國中部，接近里昂之小鎮Linoges。一七五九年七月抵達澳門，一七六〇年六月進入北京，正式成為



玄燁朝服像軸 佚名 絹本設色 縱274 cm 橫143 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關於中國之記錄》第四卷封面

清廷耶穌會團體的成員。當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解散，消息傳到北京後不出幾年，一七八〇年八月，在北京抑鬱而終。韓國英駐北京廿年間所撰寫的文章，大部分發表在韓國英與錢德明（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等人共同編撰、總計十六冊之《關於中國之記錄》系列叢書中（*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s Pékin, 1776-1791, 1814, 共十六卷*）。（註一）這套叢書可以說是十八至十九世紀歐洲學者認識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註二）與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1-1680）的漢學名著《中國圖志》（*China Illustrata, 1667*）和一七三五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出版的四冊《中華帝國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被視為近代歐洲三大漢學鉅著。韓國英所譯介的有關中國孝道相關文本，收入《關於中國之記錄》的第四卷，整體題名為《中國古今之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占該卷約三分之二的篇幅（近三百頁），透過翻譯深入介紹中國的孝道。

儘管耶穌會在一七七三年被解散，時居北京的韓國英與錢德明仍藉由相關管道，在法國皇室贊助之下，由路易十五時代掌管法國東印度公司事務的法蘭西學院院士Henri Bertin（一七一九～一七九二）負責策劃與推動，自一七七六年至一七九一年，陸續出版了十五冊。而一八一四年，在耶穌會重新恢復的同一年，《關



北京石刻博物館 韓國英墓碑 周維強提供



北京石刻博物館 韓國英墓碑拓片掃描圖

韓國英在《中國古今之孝道》一書中所譯介之孝道文本，多達十二大項，部分大項目下收錄長短不一、涵蓋古代文獻經典與當時的各種官方文本的譯介。他所挑選的官方文獻的發佈或出版時間，雖涵蓋了康熙朝三朝，但卻以康熙朝為核心。他在《中國古今之孝道》一書之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明，依古聖名訓中華帝國做為一個大家庭，皇帝是這家族的父母（l'Empereur est le Père & la Mère），為全書所選譯的「帝國文獻」（*les œuvres Impériales*）脈絡鋪路，順理成章地，將孝道與帝國緊密連結。他稱「孝」為「中國人的國家美德」（la vertu nationale des Chinois），「孝」

於中國之記錄》的第十六冊出版。此叢書內容延續了十七世紀以來歐洲中國熱的主流，以探索中國上古紀年和語言起源為起點，如同百科全書般廣泛地譯介中國歷史、經典、科學、文化、社會風俗和藝術等，書中並提供豐富的插圖。（註三）如前所述，目前學界多認為這是繼基歇爾的《中國圖志》和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志》之後，近代歐洲早期有關中國的三大鉅著之一，而且這套叢書無論在質或量的方面，均顯著提升。韓國英與錢德明二人可以說是少數在北京做最後努力的法國在華耶穌會士。清初以後，皇權越來越集中，程朱儒學又再度獲得當權者青睞，《孝經》成為科舉考試項目，孝道成為鞏固皇權理論與實務的基礎。這種學術與政治氛圍，經由韓國英的譯介，透過《關於中國之記錄》在歐洲的出版，中國孝道相關文獻得以傳入歐洲知識界。不僅如此，韓國英標榜他所譯介的孝道屬帝國文獻，在政治倫理的脈絡中，將清初康熙乾三代為主的主皇帝詮釋，傳入歐洲政治界。

除了孝道文獻的翻譯，韓國英的研究興趣很廣，他的著作廣搜各種中國經典、歷史、醫學、植物學等相關資訊。他也以*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ereur Kang-hi*為題，譯介康熙帝之《幾暇格物編》，介紹此書中康熙對物理與自然歷史的研究（註四）。韓國英的著作對中國的園藝、植物學、蠶絲與竹文化，以及天花病理和治療方法等多所介紹，例如*Notices de quelques plantes arbrisseaux de la Chine*（*樹木卷*），*"O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 les fleurs, et les arbres de Chine qu'il est possible et 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Notice sur le borax"*，*"Mémoire sur les chevaux"*（*第十一卷*）等文，洋洋大觀。此外，韓國英對中國古史和語言的研究也相當重要，在*"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第一卷*）一文，他主張竟是中華帝國的奠基者。他同時在註釋舊約以斯帖記時，將中國與猶太人作了對比，Knud Lundbaek 甚至認為他可以算是最後一位中國耶穌會符象派。（註五）

在中國，就如同「國王之愛」在法國（chez les François l'amour de leur Roi）。因此，任何意圖攻擊這倫理道德規範者，將引發全體中國人的反擊。韓國英解釋了自己翻譯這些文獻的目的：因為中國孝道多紀錄在文獻中，為了提供歐洲讀者正確認識中國孝道之相關教義與實踐的路徑，他從文本的譯介入手。

康熙皇帝對韓國英的重要性，可以從“La Piété Filiale de l'Empereur”（〈皇帝的孝道〉）一文標題，清楚觀察得到。這是一篇譯介康熙朝所頒布的《御定孝經衍義》的文章。《御定孝經衍義》全書長達一百卷，書前有康熙的〈御製孝經衍義序〉。經比對後，本人發現韓國英幾乎全文翻譯這件文本。而《御定孝經衍義》一書之正文則採譯介方式，摘要並重構之。《御定孝經衍義》雖長達一百卷，但，韓氏僅擷取書中有關「天子之孝」的部分，區分「愛親」與「敬親」兩大類，分為廿五項義務（*les devoirs*）說明天子之孝的細節。《御定孝經衍義》自卷七十五之後，即從

諸侯以下，以至庶人的孝道論述則被省略。此舉凸顯並支持了康熙序文所強調孝道核心：「愛」與「敬」兩者，並將焦點聚集在皇帝一人。（註六）

除了“La Piété filiale de l'Empereur”之外，韓國英在《中國古今之孝道》所譯介的文本中，尚有幾件文獻值得介紹：（一）“Hiao-King, ou Livre Canonique sur la Piété filiale”，此為《孝經》全文法譯。正是在此，他宣稱其《孝經》翻譯不同於衛方濟根據「古文」（Kou-ouen, vieux texte），而是根據「新文」（Sin-ouen, nouveau texte），即清朝公定文本而譯。由於不滿一七一一年歐譯首見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的譯本僅翻譯經文，韓國英的譯本包含五十六個大篇幅腳註。（二）“Placet Tseou-y”，一文，此為康熙奏議的簡介。此文本是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出版長達三百卷的「奏議」之第二卷摘譯。在此，韓國英強調自己所選取文本是所謂「帝國文獻」，與「文人文獻」（*les œuvres littéraires*）有所區別。

向皇權靠攏。韓國英對「宗教的禮」(Le ceremonial religieux)解釋篇幅相當短。相當有趣的是，他說宗教之禮是最原始、最古老，但是這個主題是「如此令人困擾、如此棘手」，所以他說自己「沒有勇氣同意這些注疏家的解釋」。而政治之



《御定孝經衍義》 清康熙二十九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禮 (Le ceremonial politique) 則是描述朝臣對皇帝的朝拜之禮，表示臣服。韓國英詳細描述跪與叩的動作。市民之禮 (Le ceremonial civil) 相較於對前面兩種禮的詮釋，韓國英對市民之禮這部分的說明，使用更長的篇幅來解釋。他說市民之禮，僅是建立在協議或約定上的集會或友誼關係，是一種榮譽與情感的連結，沒有權威性或強制性。我估計可能是指鄉約或會社。他說，這包含不同層面：(一) 藉誠信與互惠原則，制訂上下尊卑的往來或維持市民群體中公平性的方式。(二) 或是可以視為群體中當一方權利受他人侵犯或利益受損時，強制性的賠償法規。這通常是政府有權執行。他認為，一個國家越文明、誠實與謙卑，越是免於嚴厲規範與奴隸式的服從，正是在此，統治者權威得以強化，而非藉由嚴刑峻法來建立良好的社會次序。最後，韓國英指出家族之禮 (Le ceremonial domestique)，他認為這家族之禮是前述政治與市民之禮的結合。在家族內部，如同政治之禮一樣，下對上、對父母服從尊敬。

如同市民之禮，家族成員間的關係則是一系列的責任與互愛，互相照顧關心。家族成員成為一體，個人意志較為和緩，維護長幼尊卑之序，因此大家長(或指皇帝的權力)更加穩固。藉此，韓國英將家族、鄉里與帝國連結，將大家長的權威，延伸到帝國領袖皇帝身上。

韓國英的孝道文獻譯介，是在《關於中國之記錄》中，由法國皇室主導的系列叢書中出版。儘管他有意識地與其前輩衛方濟的翻譯做出區隔，但是，他事實上不是從零開始他的《孝經》翻譯。當衛方濟在一七〇三年至一七一五年之間，在天主教宗克萊孟十一世 (Clement XI, 1700-1721)，頒佈且重申中國禮儀禁令的這關鍵時刻(註七)，密集出版他的《中國六經》和《中國哲學》等書籍，捍衛中國哲學和禮儀之後半世紀，韓國英重新翻譯了前人曾經翻譯的中國經典。當耶穌會與索邦神學家和教廷宗教裁判者，處於中國禮儀應屬「宗教的」或「公民的」兩難時，衛方濟的經典翻譯，選譯《孝



《幾暇格物編》 收錄於《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四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會典》的簡介，題名為：“Notice de ce qui a rapport à la Piété Filiale dans le Code des Loix de la dynastie régnante”。此文從法律層面介紹孝道。《大清會典》是中國清朝歷代所編修清代政治制度相關內容的書籍，韓國英所譯介的《大清會典》是他同時代當朝皇帝新出版的第三部，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完成，敘事記錄止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共一百卷。(四) “D'une Déclaration de Kang-hi de l'an 1663”一文。此為一六六三年康熙所發佈的告示，內容與葬禮有關。此文描述康熙在經歷祖母之喪後，在葬禮上所表現的豐富真實的情感。最後他依序列舉古代自皇帝以下多位著名孝子的事蹟，並在文末提供一個總結為「孝治」的六點結論。

如前文已及，韓國英所選文本都是他所謂的「新文」，或者可說是與韓國英同時代的「時文」，且為朝廷所頒佈之文獻。他明確說明自己所譯為「天子之孝」，譯介所據之本並非民間文人墨客的著作，而是朝廷頒佈的官方通行本。韓國英翻譯《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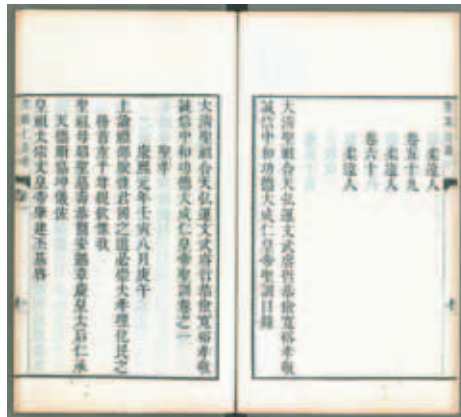
經》，是在他名下《中國古今之孝道》一書所收入譯介的相關文本，就是前述介紹過的《御定孝經衍義》、《奏議》、《聖祖仁皇帝聖訓》、《大清會典》等等古今「帝國文獻」脈絡之中進行的，與衛方濟以「人文獻」脈絡並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韓國英的《中國古今之孝道》還依序列舉古代自皇帝以下多位著名孝子的事蹟，似乎欲藉此向歐洲讀者證實其所譯介的孝道論述，在中華帝國是以皇帝為中心具體實踐的德行。「孝」在中國傳統佔據核心地位。中國禮儀之爭的核心正是在此。「禮」的性質，尤其倍具爭議的祭天、祭祖禮儀應當被理解為宗教行為或家族倫理行為，其爭議的方式與內容，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歷經不同階段。

韓國英在翻譯《孝經》時，將「禮」區分為四個層面：宗教的 (le religieux)、政治的 (le politique)、市民的 (le civil) 與家族的 (le domestique)，從不同面向捍衛著天子的權力 (Chacun contribue à affermir et à conserver le pouvoir souverain)，

1. 目前有幾篇論文討論這套叢書的部分內容，例如N. Standaert, "Ritual Dances and Their Visual Presentation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no.1 (2006): 68-181; Chao Ying Lee, "Integration of Foreign Culture with Local Culture: The Icons of Confucius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91) in France," *Sino-Christian Studies*, no. 4 (2007): 109-35.
2. Cf.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1932), 890-902.
3. 叢書緣起請參閱第一卷之前言，*Mémoires*, 1:i-xv，另參Joseph Dehergne, "Une grande collection :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814),"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LXXII (1983), pp. 276-277.
4. 見 "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et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ereur K'ang Hi," in: *Mémoires*, vol. 4, pp. 452-483. 另參見費賴之著，馮承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943-944。
5. Knud Lundbaek, "Pierre Martial Cibot (1727-1780)-The Last China Figurist,"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 Journal*, vol. XV (1993), pp. 52-59.
6. 詳見潘鳳娟，〈皇帝的孝道——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譯介《御定孝經衍義》初探〉，《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第8期(2009)，頁147-187。此處不贅。
7. 1704年，天主教宗克萊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正式禁止中國耶穌會的禮儀政策與上帝譯名。1715年，同一教宗重申1704年的禁令，頒佈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通諭，嚴令完全遵守之，否則開除教籍。這命令在1742年被新任教宗本篤十四（Benedict XIV, 1740-1758）加以絕對化，自此任何有關中國禮儀的討論也完全禁止。參閱Ray R. Noll (ed.), Donald F. St. Sure, S.J., (trans.),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2), pp. ix, xii, 8-24, 47-62.
8. 詳見潘鳳娟，〈中國禮儀之爭脈絡中的孝道：衛方濟與《孝經》翻譯初探〉，《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33期(2010)，頁67-95。

參考書目

1. Noël, François,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Pragae: J. J. Kamenicky, 1711)
2. Björn Löwendahl, *China Illustrata Nova. Sino-Western Relations, Conceptions of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Hua Hin, The Elephant Press, 2008.
3. Cibot, Pierre-Martial, *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 in Joseph Marie Amiot et. al.,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s Pékin*, vol. 4 (1779), pp. 1-298.
4. Confucius, *Le livre de la piété filiale*, trad.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Roger Pinto. Suivi de la traduction ancienne et des commentaires, publ. par le R. P. Cibot., *Traduction de Hiao-king* (Paris: Éd. du Seuil, 1998).
5. Standaert, Nicolas, "Ritual Dances and Their Visual Presentation in the Ming and the Qing,"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2, no.1 (2006), pp. 68-181.
6. Lee, Chao Ying, "Integration of Foreign Culture with Local Culture: The Icons of Confucius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91) in France," *Sino-Christian Studies*, no. 4 (2007), pp. 109-35.
7.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1932).
8. Lundbaek, Knud, "Pierre Martial Cibot (1727-1780): The Last China Figurist,"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 Journal*, 15 (1993), pp.52-59.
9. Dehergne, Joseph, "Une grande collection :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814),"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LXXII (1983), pp. 267-297.
10. 費樂仁著，陳京英譯：〈攀登漢學中喜馬拉雅山的巨擘——從比較理雅各（1815-1897）和尉禮賢（1873-1930）翻譯及詮釋儒教古典經文中所得之啓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5卷2期（2005），頁21-57。
11. 潘鳳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理雅各與比較宗教脈絡中的《孝經》翻譯初探〉，《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審查通過，刊登中。
12. 潘鳳娟，〈中國禮儀之爭脈絡中的孝道：衛方濟與《孝經》翻譯初探〉，《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33期（2010），頁67-95。
13. 潘鳳娟，〈皇帝的孝道——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譯介《御定孝經衍義》初探〉，《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第8期（2009），頁147-187。
14. 潘鳳娟，〈孝道、帝國文獻與翻譯：法籍耶穌會士韓國英與《孝經》翻譯〉，2010年4月19~22日於中原大學通識中心、中央大學歷史所與基督教史學會合辦之「文本解讀與經典詮釋——督教文學學術研討會」宣讀，投稿中。



《大清聖祖仁皇帝聖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經》之舉，讓禮儀爭辯的核心轉向「孝道」，凸顯其倫理面向。這不僅是對中國禮儀之爭的回應，也是對同時期中國學術發展的回應。（註八）儘管如此，在韓國英的標準裡，仍舊是「文人文獻」和「古文」，仍是一種在文人脈絡中的詮釋。因此他



乾隆朝 《大清會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進一步將焦點從衛方濟譯本所呈現的「文人文獻」的中國儒家，轉向「帝國文獻」、皇權之下所詮釋的帝國儒家，而且延續了衛方濟《中國六經》出版於禮儀之爭顛峰，韓國英之帝國孝道文獻的翻譯則見於中國禮儀之爭末期，世俗君主的權力逐漸凌駕天主教會之上。身為衛方濟《孝經》譯本的評論者與補充者，韓國英的《孝經》翻譯手法，實則延續了衛方濟的倫理轉向，並且更進一步隨著時間演

變，他所譯介的文獻選材進一步聚焦皇權，以帝國文獻為介紹重點。事實上，中華帝國的政治和倫理，在十七世紀已經成為歐美知識階層關注焦點。韓國英身處乾隆朝，其所譯文本也不是在法國最強盛時期出版，但所選譯之文獻卻以康熙朝為主軸，康熙皇帝的形象在韓國英的孝道文獻翻譯中顯得如此偉大神聖。對應著這位在歐洲君權神授觀念顛峰時代掌權的、集政治與宗教權力於一身、在伏泰爾筆下自稱「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派遣韓國英的前輩耶穌會士如白晉、李明等人前來中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韓國英之直接全面地譯介清朝的「帝國文獻」，並且在法國皇室主導的有關中國的系列叢書中出版，似乎突顯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所及，已經對其政治結構、倫理體系產生某種影響甚至是衝擊。儘管我們尚沒有直接證據說明這些中國相關的書籍之出版與路易十六時代的變局有甚麼關係，但是我認為，這應該會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索的方向。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